

DOI:10.13288/j.11-2166/r.2026.01.001

“象”与“形”的哲学意蕴及其在中医药领域的理论建构与未来价值

王永炎, 马艳, 范逸品[✉]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 100700

[摘要] “象”与“形”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核心范畴,共同构筑了迥异于西方主客二分思维的认知范式。二者源于共同的“气”本体,呈现“象”主变易、虚灵、功能与“形”主确定、实体、结构的对立统一关系,并通过同源共生、互化互生、体用相涵达到深层统一。这一“象-形”辩证范式深度嵌入中医药理论体系,从藏象学说的多层次建构,到“以象测藏”的认知路径、“观象治形”的诊疗实践,再到“重气兼形、形气合一”的学术特色,均是其具体体现。面向未来,“象-形”范式不仅能为中医药理论现代化与中西医互补提供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亦能在临床精准诊疗、中药创新研发及质量控制等领域彰显独特的实践价值,推动中医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当代生命科学贡献整体、动态的中国智慧。

[关键词] 象;形;中医药理论

中国哲学自先秦时期便形成了迥异于西方“主客对立”思维范式的独特认知体系,“象”与“形”作为这一范式的核心范畴,贯穿于《周易》《老子》《黄帝内经》等经典文本的思想脉络,共同构筑起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底层逻辑架构,成为连接哲学思想与实践技术的核心枢纽。从认知起源看,《周易·系辞上》提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确立了以“象”“形”作为认知枢纽的思维传统;《老子》“大象无形”的论断则将“象”的内涵从具体感知升华为哲学层面的抽象体悟,完成了从具象到本体的哲学跃升。《素问·五运行大论篇》“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的阐释,进一步揭示二者关系——这种“形器象用,据象识形,窥外知内”的认知思维,使“象”与“形”的概念渗透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各个领域,成为贯通哲学思想与中医药实践的核心桥梁。中国传统哲学对“象”的重视自20世纪90年代王树人教授提出“象思维”^[1]观念后达到新的高度,引发学界对“象思维”特性的广泛探讨。

学者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也指出“象思维”存在随意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等局限^[2-3]。此外,纵观既有研究,对于“象”与“形”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基础性问题,学界却鲜有系统深入的探讨,这已成为相关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本文旨在系统发掘“象-形”范式的哲学意蕴,深入探讨其在现代中医理论创新、临床精准诊疗、中药研发及中西医互补中的实践价值,构建“象-形”并重的中医药现代化发展路径。

1 “象”与“形”的概念溯源与核心内涵

“象”与“形”作为一对哲学范畴,其语义演化与内涵深化历经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二者既各自拥有清晰的发展脉络与核心特质,又在互动中共同构成了中国哲学独特的认知架构。

1.1 “象”的概念溯源

“象”的语义演化呈现出从具体指涉到哲学抽象的鲜明历史层递性。在甲骨文中,“象”为象形字,本指“南越大兽”,属具体物象名词,尚未具备哲学意涵。至殷周之际,《周易》的成书完成了对“象”的首次哲学提升。《周易·系辞上》明确提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又言:“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由此,“象”与“形”

基金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项目(ZZ032, ZZ016)

✉ 通讯作者:hysf168@163.com

被置于宇宙生成论层面进行区分：“象”对应天象之流动变化（如日月星辰、四时更迭），“形”对应地物之固定实体（如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正如钱钟书所言：“‘形’者，完成之定状；‘象’者，未定形前沿革之暂貌”^[4]，张岱年亦指出，“象”无定形而仅可观察，“形”则兼具可观察性与可触摸性^[5]。此时，“象”已初具“关联性”与“象征性”特征。《周易》以八卦“卦象”系统（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等）将复杂的自然现象抽象为可解读的符号体系，实现了从“具体现象”到“符号象征”的关键跨越。先秦诸子进一步拓展了“象”的意涵。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大象无形”，将“象”从感官可及的现象层面，提升至作为万物本原的“道”的显现层面：“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表明最高的“象”（大象）超越一切具体形质，是“道”本身恍惚状态的呈现。汉魏时期的易学家在注解中深化了“象”的内涵。韩康伯注《周易·系辞》时提出：“阴阳者言其气，刚柔者言其形。变化始于气象，而后成形。”^[6]此论将“象”与“气”紧密关联，界定“象”为阴阳之气流转变化、有质而未成形的初始状态，突出了“象”的动态变易性。唐代孔颖达提出“气渐积聚，露见萌兆，乃谓之象，言物体尚微也”（《周易正义》），认为“象”是气聚集而未成形的状态。宋明理学时期，“象”的范畴在与“理”“气”心性论的深度融合中达至哲学思辨的巅峰。张载立足气本论，提出“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将一切存在归于“气”之“象”，认为“象”的本质是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具有“有象斯有对”（《正蒙·太和》）的矛盾统一性。程颐提出“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程氏易传·序》），将“象”视为“理”之“用”与“显”，是“理”在现象世界的显现形式。明代王夫之提出“阴阳分象而刚柔分形”“事无其形，心有其象”“使之各成其象者，皆气所聚也”（《船山全书·张子正蒙注》），将象与形对举，认为“形”指称的是具有确定内容和形式的实体所呈现的形态，“象”则指称的是能够确认其存在却又不能直接看到的、非具体的、非实体化的对象。而且“象”介于“形”与“气”之间，以其非物质性区别于形，以其可感知性区别于气。“象”虽不具备物质形式，却充斥于物质之中、凌驾于物质之上，对物质的完整认知有赖于对“象”的感知和把握^[7]。

1.2 “象”的核心内涵

中国哲学中“象”的核心内涵具有鲜明的层次性与特质统一性，可从存在形态、本质属性构建完整体系，各维度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彰显“象”作为“气之动”的本质规定。

从存在形态的递进性看，“象”呈现为由表及里、由显至隐的三层结构。第一层为物象，即“现象之象”，指事物外在呈现的可观察现象，如天象、地貌、人体面色等，构成“象”的基础层面。第二层为意象，包含两个子层面：一是符号意象，即思维主体对物象进行抽象提炼形成的符号系统，如《周易》卦象、中医脉象等，具有以简驭繁的特征，是连接具体现象与抽象意义的中介，体现立象以尽意的表意功能；二是规律意象，即符号与现象背后蕴含的本质规律与深层意涵，如阴阳之象、五行之象所体现的事物运行法则，构成“象”的核心层面。第三层为原象或本体之象，即《老子》中的“大道之象”，是涵盖心物、消融主客的本体性存在。朱熹《周易本义·周易五赞》“原象”篇对此有精辟论述：“太一肇判，阴降阳升。阳一以施，阴两而承……阴阳交错，以立四象”，揭示原象的本体论内涵。

从本质属性的统一性看，“象”贯穿变易性、整体性与功能性三大核心特质。变易性是“象”的根本属性，其作为“气之动”的存在形态，始终处于阴阳二气相互交感的过程，呈现流动性、潜在性、可能性特征，如四季物候、人体神色的动态变化皆为其具体体现。整体性源于“气”的贯通性，“象”以“气”为纽带将万物联结为有机网络，任何一“象”皆是整体关联的局部显现，如《周易》六十四卦通过爻象组合呈现万物关联便是典型例证。功能性体现“象”的价值核心，其意义不在于描述外在形态，而在于揭示事物内在功能与发展态势及本质意蕴，如乾卦“龙象”象征君子自强不息的特质，中医脉象反映人体气血运行状态，均凸显“本质直观”的认知价值。

1.3 “形”的概念溯源

与“象”的变易性相对，“形”的概念演化始终围绕“实体性”这一核心展开，逐步从指代具体形体发展为承载“象”“神”“道”的哲学载体。“形”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已见雏形，本义为“形体”“形态”。《说文解字》释为“象也。从彡，开声”，段玉裁注明指出：“形，谓实体；象，谓虚象”，初步厘清了“形”的实体性特征，与“象”

的“虚象”属性形成明确分野。

先秦时期,“形”的哲学定位得以确立。《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将“形”作为“道”与“器”的分界,其本身指具有空间形态、可被感知的具体存在。《荀子·天论》提出“形具而神生”,将“形”视为精神活动产生的物质基础,强调了其作为生命载体的根本性。庄子则从生命哲学角度界定,“物成生理,谓之形”(《庄子·天地》),视“形”为生命得以生成和维持的外在框架。汉魏时期,“形”与“气”“神”范畴深度结合。南北朝范缜在《神灭论》中主张“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在形神关系中强化了“形”的物质本体地位。这进一步深化了“形”作为生命存在之物质根基的内涵。宋明理学家多从“理气”关系论“形”。张载从气本论出发,提出“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正蒙·太和》),将“形”界定为“气之聚”的可见状态。明代王夫之也指出:“象者未聚而清,形者已聚而浊”(《船山全书·张子正蒙注》),厘清了“象”(抽象征象)与“形”(具体形质)的层级关系,既肯定了二者同源于气的统一性,又明确了其因气之聚散而形成的差异性,为阐释生命现象中“气-象-形”的转化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

1.4 “形”的核心内涵

中国哲学中“形”的核心内涵以“实体性”为根基,延伸出确定性、结构性与载体性三大特质,构成“形”的完整哲学意蕴。实体性是“形”的本质属性,也是其与“象”的根本分野。“形”是事物可被感官直接感知、具有明确空间边界与物质形态的存在,如具体的器物、人体的解剖结构。正如《永乐大典·采真集》所言“气聚为象,凝则为形”,“形”源于“气”的凝结与固化,是“气之静”的呈现状态;确定性与结构性是“形”的存在特征。“形”是事物生成变化的阶段性完成状态,具有相对稳定性、可感性与规定性。如贡华南所言,其为“既成而不能变化者,是事物的完成之定状”^[8]。同时,“形”具有清晰的结构性,《说文》以“彡”(毛饰画文)释“形”,暗示其外在可辨的纹理与组织关系,使之成为可分析、可度量的对象;载体性是“形”的核心价值,体现为其对“象”“神”“道”的承载功能。相对于“象”,“形”是“象”得以显现和依附的物质基础,无“形”则“象”无所依托。相对于“神”,“形”是精神活动

赖以产生的物质根基,“形具而神生”“形存则神存”的命题确立了“形”对“神”的支撑作用。相对于“道”,“形”是“道”在现象界的具体化与外化载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定位,使其成为“道”得以落实和应用的实践依托,实现了“循形以载用”的价值。这种多重的载体性,使“形”成为沟通抽象规律与具体存在的关键环节,构成中国哲学“体用一源”的重要支撑。

2 “象”与“形”辩证关系的深层意涵

“象”与“形”并非孤立或对立的概念,二者构成了一个蕴含深刻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体,其关系可从对立性与统一性两个层面进行系统阐发。

2.1 对立关系

二者的对立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体现了事物存在的不同面向与认知的不同侧重。1) 变易性与确定性——动与静的对立:“象”主变易,作为“气之动”的显现,处于持续流动、未定形的过程之中,如气象万千、脉象流利。“形”主确定,作为“气之聚”的结果,具有相对稳定、可固化的空间形态,如山体轮廓、脏器解剖位置。在认知上,这要求“象不可执”(不可僵化理解)与“形不可离”(不可脱离实体),形成动态把握与静态分析的张力。2) 虚灵性与实体性——虚与实的对立:“象”显虚灵,超越具体形态,指向意境、神韵、功能态势等非实体性存在,如“大象无形”、中医的“气机”之象。“形”呈实体,拥有可触摸、可度量的物质结构与空间占位。“象”的虚灵性与“形”的实体性,构成虚体象征与实体存在的对立,不过这种“虚与实”的对立并非割裂,而是“虚以统实、实以载虚”的统一,如生命体中“神”(虚象)与“形”(实体)的相互依存。3) 功能性与结构性——神与器的对立:“象”以明神(功能、规律),其认知旨趣在于把握事物的内在功能、作用趋势与本质意蕴,如卦象揭示变化之道,藏象说明脏腑功用。“形”以察器(结构、载体),其认知旨趣在于厘清事物的外在物质构成与组织形态,为功能实现提供基础。二者构成功能象征与结构载体的对立,对应着中国哲学“形而上者谓之道”(重功能规律)与“形而下者谓之器”(重结构实体)的范畴分野。

2.2 统一关系

“象”与“形”的对立是相对的,其深层本质是有机统一的,二者的统一体现为同源共生与相互

依存、互化互生与动静相济、体用相涵与道器贯通三重有机关联。1) 同源共生与相互依存。“象”与“形”同源于“气”，是“气”的两种同步显现形态。“气”的弥散运动状态为“象”，其凝聚固化状态为“形”。正如苏轼所言：“象者，形之精华，发于上者也；形者，象之体质，留于下者也”（《东坡易传·卷七》）。在存在论上，二者构成功能性互补结构：无“形”则“象”无所依附（如舌象需舌体承载），无“象”则“形”失其生机（如死物虽有其形，却无生命之象）。此即嵇康《养生论》所概括的“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2) 互化互生与动静相济。在宇宙生成变化中，“象”与“形”在“气”的推动下，形成“象→形→象”的动态循环过程：事物初始阶段，“气”的运化呈现为“象”的变易态势，随着气的凝聚，“象”逐渐固化为“形”的确定结构；当“形”的结构发展到极致并发生改变时，其内部运动又展现出新的功能态势，新的“象”得以显现，循环往复，构成事物的生、长、化、收、藏或生命的生、长、壮、老、已的完整历程。“象”与“形”还体现动静相济的特性：象主动，形主静，“象”作为气的运动状态之外显，本质是动态的、趋势性的、功能性的，它赋予过程方向与活力；“形”作为气的凝聚固化状态本质是静态的、结构性的、载体性的，它为运动提供稳定依托与边界。真正的“静”蕴含气的运化潜能，故“形中有象”；真正的“动”蕴含恒常规律与可识别态势，故“象中有形”。二者相济即结构稳定性与过程流动性的统一，无“形”之静则“象”之动流散无归，无“象”之动则“形”之静枯竭消亡，唯有动静相济方能成就大化流行、生生不息。3) 体用相涵与道器贯通。这是二者统一的最高哲学表达，包含两层互诠的视角。从存在论视角看，“形为体，象为用”：“形”作为实体结构（体），是功能产生的内在根据；“象”作为功能表现（用），是结构本质的外在彰显。如中医肝脏的实体（形之体）是其疏泄功能（象之用）的基础；无此形体，功能无从谈起；无此功能，形体亦失其生命意义。此即程颐所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从道器论看，“形为器，象为道”：“形”是具体可感的形下之“器”，“象”是蕴含于器中、反映规律的形上之“道”。形之实体（器）承载并显现象之功能（道），功能之象（道）又规定和赋予形之实体（器）以意义。通过观“象”可以明“道”，凭借察“形”可以识“器”，道器不离，共同构成“即体即用、即

器明道”的圆融整体。

3 “象”与“形”在中医药领域的理论建构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载体，其理论体系的构建与诊疗思路的形成均深度融入“象”与“形”的哲学思维。从藏象学说的“以象测藏”到诊疗实践的“以象辨证”，再到“重气兼形，形气合一”的学术特色，“象”与“形”的思维贯穿于中医药的各个领域，成为中医药区别于现代医学的核心特征。

3.1 藏象学说中“象”的层次结构与哲学意蕴

作为中医理论核心范畴，藏象学说中的“象”承接中国哲学“象”的层次化及本体论内涵特质，涵盖物象、意象、太虚原象三个维度。第一重为感知层面的物象，是藏象认知的基础，对应哲学层面的“现象之象”，指人体生命活动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征象。具体包括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所收集的面色、舌象、脉象、声息、情志状态、九窍状况等一切可被直接察知的体征。藏象学说中的物象阐释，本质上是将普遍意义上的具象之象与人体生命活动相结合，构建起外在征象与脏腑状态的关联基础，为后续的抽象认知提供具象依托。第二重为思维层面的意象，是藏象理论构建的关键，是对“物象”进行归类、抽象与模式化所形成的功能关联模型与规律认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系统关联意象，运用取象比类思维，将人体脏腑功能与自然之象进行系统性配属，构建如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的五行-五脏模型，建立天人相应的关联网络；二是规律概括意象，是对生命与疾病根本法则的提炼，如“阴平阳秘”“阳盛则阴病，阴盛则阳病”等概括了脏腑生理病理的基本规律。此层面对应哲学层面的符号意象与规律意象。第三重为本体层面的太虚象，此层面将藏象学说提升至宇宙本体论的高度，对应哲学层面的“原象”与“道象”。《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云：“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这里的“太虚”，指派生万物、统御乾坤的宇宙本原。在藏象学说中，人体被视为“太虚”原象演化而成的、与天地四时相参的微观宇宙，脏腑气血的运行从根本上遵循着“太虚”所蕴含的阴阳五行、气化周流的宇宙根本法则。因此，对人体之“象”的终极理解，必须置于此“原象”背景下，实现天人相应的本体性回归。无论是从普遍哲学还是具体医学角度，“象”的内涵均呈现出从具体现象（物象），到

抽象模型与规律（意象），最终达至宇宙本体（原象/道象）的递进逻辑。藏象学说正是通过这三重“象”的递进，完成了从具体体征到功能模型，再到宇宙法则贯通的理论建构。

3.2 “以象测藏”的脏腑认知体系

藏象学说以“象”为认知工具，以“藏”（脏腑）为认知对象，构建了独特的“以象测藏”体系。这里的“藏”，是“形”（解剖实体）与“象”（功能状态）的统一体。《素问·六节藏象论篇》关于“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的论述中，“藏象”既包括心脏的“形”（与血脉相关），更强调了心之“象”（其华在面、通于夏气等功能关联）。中医药对脏腑的认知并非通过解剖观察“形”的结构，而是通过观察外在之“象”（面色、脉象、情志）推断脏腑功能状态，即“有诸内必形诸外”。“以象测藏”的逻辑基础在于“形”与“象”的“体用不二”。“形”（脏腑实体）为“体”，决定了“象”产生的物质基础；“象”（外在征象）为“用”，是“形”之内在功能状态的外在显现。因此，通过观察外在之“象”的变化，可以推测内在之“形”（脏腑）的功能盛衰与病理改变。例如，肝的疏泄功能失常（象的层面：气机郁滞），可在外显现为情志抑郁、胁肋胀痛（物象），甚或导致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等形质改变（形的层面）。这种认知方法超越了对“形”的孤立解剖观察，从整体关联和功能动态的角度把握生命，体现了司外揣内、由用知体的思维优势。

3.3 象思维视角下的诊疗实践体系

中医诊疗实践的核心是辨证论治，其全过程贯穿着“象思维”，形成取象比类、以象辨证、据象施治的完整路径。

取象比类是象思维的核心方法，逻辑依据在于象同则理同，通过类比自然之“象”与人体之“象”揭示生命活动规律与疾病诊疗原理。在脏腑功能认知层面，将自然界“木”的“曲直条达”之象与肝脏“主疏泄”的功能之“象”联通，将“火”的“温热向上”之象与心脏“主血脉、藏神”的功能之“象”对应，构建五行藏象诊疗体系，为脏腑功能异常辨证提供理论支撑。在药物选用层面，遵循“药象与证象相契合”原则，根据药物形态、色泽、性味等“象”特征匹配疾病“证象”，如石膏色白、质重、性寒，其“象”与“清热泻火”功效契合，用于实热病症治疗；柴胡“条达”

之象与肝脏疏泄功能失常的“肝郁气滞证”匹配，为疏肝理气要药。在临床诊断层面，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收集患者宏观与微观之“象”（舌象、脉象、症状群等），再比类归类归属于特定“证象”，如将“发热、恶寒、无汗、脉浮紧”等征象类比为“风寒束表”之象，完成从征象到证型的辨证过程。

诊疗实践以“以象辨证”为核心，本质是诊断阶段“观象辨形”与治疗阶段“据象治形”的临床思维过程，体现“象”与“形”辩证关系的实践应用。

诊断阶段的核心是“观象辨形”，即通过“四诊合参”（望、闻、问、切）收集患者的“象”（面色、脉象、声音、气味、情志等），进而推断患者“形”（脏腑、经络，形体）的病变状态。如通过望诊观察患者“面色苍白”，闻诊听其“声音低微”，问诊知其“畏寒怕冷”，切诊触其“脉象沉迟”，综合这些“象”，可辨证为“阳虚证”，进而推断其“形”（心肾）的虚损。这里的“辨证”本质上是对“象”的整合与解读，通过“象”的集合把握“形”的病变本质。诊断过程就是从物象（如面色、脉象）上升到意象（病机规律意象），再回归到道象（脏腑气血的生理病理，从根本上遵循着“太虚原象”或“道象”所蕴含的阴阳五行、气化周流的宇宙根本法则）的认知过程，这一过程本质上是“象”的提炼与“形”的还原。如通过心烦失眠、舌赤生疮、吐衄、尿赤（物象），上升为“心火亢盛证”（意象），进而辨其出生和发病的年份是否受五运六气影响（道象）。《素问·宝命全形论篇》有言“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因出生年岁和后天成长受到不同运气因素影响，人体体质呈现不同倾向，表现出对某类疾病因素的易感性、趋同性、差异性，以及相关脏腑先天禀赋的强弱盈亏，此即回归原象或道象，推断脏腑内在形质与气化的原始状态及易变趋势。

治疗阶段的核心是“据象治形”，即根据辨证得出的“象”，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通过调整“象”的状态，进而改善“形”的病变，亦即通过调整气化之“象”来修复形质之损伤，体现“从象入手、以象调形”的治疗思路。中医治疗的根本目标并非单纯消除症状，而是恢复“象-形”的动态平衡。例如，对于脾虚泄泻（形质损伤），中医并非直接针对肠道形质进行治疗，而是通过健脾益气的方法调整脾胃气化之“象”，使脾胃运化功能恢复正常，进而修复肠道形质的损伤；对于阴虚火旺（气化失常），通过滋阴降火调整气血运行之“象”，

使阴平阳秘，进而保护脏腑形质免受虚火灼伤。这种“调象以安形”的治疗思路，体现“象为先导，形为归宿”的逻辑——气化之“象”的恢复是形质修复的前提，形质的健旺是气化正常的保障。

中医诊疗思维中“象-形”互动的极致体现是异病同治与同病异治：当不同疾病表现相同“象”（证型），尽管形质损伤部位不同，仍可采用相同治法（异病同治）；当同一疾病表现不同“象”（证型），尽管形质损伤部位相同，仍需采用不同治法（同病异治）。如吴茱萸汤可治疗阳明病、少阴病、厥阴病中的呕吐症状，核心在于三者均表现寒邪犯胃的共同之“象”，尽管涉及脏腑形质不同，但调整气化之“象”的目标一致，这种诊疗思维本质是抓住“象-形”关系核心矛盾实现对疾病的整体调控。

3.4 “重气兼形，形气合一”的学术特色

中医药学在整体上呈现出“重气化、兼形质”的学术特色，即高度重视“气化”功能之“象”，同时不忽视“形质”结构之“形”，追求“形气合一”。

“气化为本”是中医药学核心学术主张，气化指脏腑功能的运动变化过程，本质是“象”的动态呈现，如肺气“宣发肃降”、脾气“运化升清”均是气化功能的具体表现。《素问·六微旨大论篇》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强调气化运动是生命存在的根本，一旦气化停止生命即告终结。在病理层面，中医认为疾病本质是气化功能失常而非单纯形质损伤，如“痰湿内停”本质是脾运化水湿气化功能失常形成“痰浊”之象，治疗需“健脾化痰”恢复气化而非直接去除形质，这种“以气化为本”的认知使中医摆脱对具体形质的依赖，形成整体、动态的生命观。

“形质为用”是中医药学重要补充，中医并不否定形质的重要性。《灵枢·天年》言：“形者生之舍也。”形质是气化活动的场所与物质基础。在临床中，中医既善于调气以治形（如上述），也注重在形质损伤明显时直接治形，如用接骨续筋药治疗骨折，用软坚散结药治疗癭瘤瘰癧，同时配合调气活血以助形复。这体现了形气并重、形气合一的圆融智慧。

4 “象”与“形”范畴在中医药领域的未来价值

在科技文明时代，深入发掘“象-形”范式的哲学意蕴，对于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国际化，乃

至构建人类新医学范式，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4.1 理论创新：构建中西医互补的生命认知体系

“象”与“形”的哲学范畴为中医药理论创新提供核心抓手，在中西医融合背景下可弥补西方医学“重形质、轻功能”的不足，构建更完整的生命认知体系。西方医学以还原论为基础，侧重对形质的微观解析，形成对器官、组织、细胞的精细认知，但在把握整体功能、动态变化方面存在局限。中医药学“象”范畴提供动态、整体的认知视角，“象思维”可整合多维度功能信息，揭示生命系统整体规律。未来可通过“象”“形”范畴的桥梁作用实现中西医理论互补：一方面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基因组学、代谢组学）解析中医“象”的物质基础，如通过研究舌苔微生物组揭示“舌象”与脏腑功能关联，使“象”从模糊经验描述走向精准科学阐释；另一方面以中医气化理论为指导丰富西方医学对生命功能的认知，如将“肝主疏泄”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调控结合，构建“形质-功能-环境”三位一体的生命认知模型。同时，“象”“形”范畴的辩证关系可为中医药理论现代化提供方法论指导。当前中医药理论面临“以西释中”困境，部分研究试图用西方医学形质概念解读中医“象”范畴导致中医特色丧失。未来应坚持“象”“形”并重原则，避免“唯象主义”空谈与“唯形主义”的局限，在保持中医整体思维基础上吸收现代医学形质研究成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

4.2 临床转化：推动精准医疗与个体化治疗的发展

“象-形”结合的诊疗范式，与当代精准医疗“个体化”核心理念高度契合，并能为其提供独特的实现路径。在诊断层面，可构建“象-形融合”的精准诊断模式。将中医四诊信息（功能之“象”）与现代医学的影像学、病理学、基因组学等检查结果（结构之“形”）进行多维度整合。例如，对肿瘤患者，既评估其CT/MRI显示的肿瘤形态、位置、大小（形），又结合中医辨证判断其气血阴阳盛衰、正气与邪气的关系（象），从而对患者的病情阶段、预后及治疗反应做出更全面的评估。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建立“证候-生物标志物”关联模型，是实现这一融合的关键技术路径。在治疗层面，可发展“调象-治形协同”的个体化治疗方案。根据“象-形”诊断结果，制定中西医优势互补的治疗策略。例如：对于冠心病，

可在现代医学介入治疗（支架置入，直接改善“形”之狭窄）的同时或前后，结合中医药“活血化瘀、化痰通络、益气养阴”等治法（调整气血瘀滞、痰浊内阻之“象”），以改善微循环、稳定斑块、减少再狭窄，实现“形气同调”。这种协同模式能更大程度地提升疗效、减少副作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并可通过真实世界研究、循证医学方法构建高级别证据体系。

4.3 产业发展：引领中医药创新药研发与质量控制

“象-形”范畴能为中医药产业，特别是创新药研发与质量控制，提供创新的思路与标准。

在创新药研发方面，可构建“以象为据、以形为基”的研发模式。传统中药研发基于“象思维”，通过取象比类筛选药物，如根据“红色入心”象思维筛选丹参、红花等活血化瘀药；现代中药研发侧重药物物质成分解析，如提取中药有效单体（青蒿素、紫杉醇）。未来可将二者结合：一方面以中医“象”理论为指导明确药物功效之“象”，如清热药的寒凉之象对应其抗炎、退热功效；另一方面运用现代药学方法解析其物质基础（“形质”成分），并通过细胞、动物模型及临床试验验证其药理作用与“象”所述功效的关联性，最终明确“药象-成分群-功效靶点”之间的科学对应关系。这既能保持中药多成分、多靶点的整体调节特色，又符合现代药物研发的规范要求。

在质量控制方面，可建立“象-形”结合的质量评价体系。当前中药质量控制主要采用“形质评价”（有效成分含量、性状鉴别），但难以反映中药整体功效。中医认为中药质量核心在于“气”的强弱，“气”的状态通过“象”体现，如优质黄芪“单枝粗长，质坚而绵、味甘”之象对应其“补气升阳”功效。未来可构建“象评价”与“形评价”结合的质量标准：“象评价”采用高分辨色谱、光谱技术建立能反映中药整体化学特征的指纹图谱或代谢组学图谱（化学“象”）；引入电子舌、电子鼻等智能感官技术模拟和量化传统经验鉴别中的气味、味道等信息（感官“象”）；探索将药效学生物评价方法纳入质量控制，关联产品的功能属性。“形评价”采用成分含量测定、微生物限度检查等方法保证中药安全性与有效性。这种“形神（象）兼备”质量评价体系可更全面反映中药质量，为中

医药产业规范化发展提供保障。

5 结语

“象”与“形”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范畴，其蕴含的辩证思维不仅构筑中国传统认知范式的底层逻辑，也成为连接哲学思想与中医药实践的核心桥梁。这一对范畴不仅是中医药理论建构的基石，更是其未来创新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坚持“象”“形”并重的原则，既是对中医传统思维特色的传承，也是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内在要求。对“象”与“形”哲学意蕴的深度发掘及其在中医药领域价值的重新审视，不仅是对中华文明根本思维方式的溯源与确认，更是在科技文明时代推动医学范式革新、回应人类健康复杂挑战的宝贵智慧。

展望未来，“象-形”范式作为承载中国智慧的独特认知工具，其价值不仅在于为中医药现代化提供核心抓手，更在于为生命科学的发展提供超越单纯结构分析的整体、动态新视角。随着现代科技与传统智慧的深度融合，“象-形”范畴所蕴含的整体观、动态观将进一步彰显其时代价值，推动中医药在理论、临床与产业等领域实现突破。唯有深入挖掘其哲学意蕴，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应用，推动其与现代科技的创造性结合，才能实现中医药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这一古老范式在未来的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中持续焕发生机，最终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王树人,喻柏林. 象思学论纲[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4):69-78.
- [2]贺娟. 科学方法论视野下的取象思维[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35(12):797-800.
- [3]张宇鹏,吴朦,王国为,等. 中医学认知模式探析[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5,31(11):1908-1914.
- [4]钱钟书. 管锥篇[M]. 北京:中华书局,1999:611-612.
- [5]张岱年.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M]. 北京:中华书局,2017:124.
- [6]楼宇烈. 王弼集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0:576.
- [7]陈娟. 论王夫之“诗象其心”的诗学思想[J]. 中国美学研究,2022(2):135-149.
- [8]贡华南. 中国思想世界中的形与象之辨[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0(3):18-23,120.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Xiang (Manifestation)" and "Xing (Physique)" and Their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Future Valu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NG Yongyan, MA Yan, FAN Yipin

Institute of Basic Research in Clinical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ABSTRACT As a pair of core categori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xiang (manifestation)" and "xing (physique)" together construct a cognitive paradigm distinct from the western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Both originate from the common ontological foundation of "qi", exhibiting a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xiang"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change, virtuality, and functionality, and "xing"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determinacy, substance, and structure. Their relationship achieves profound unity through shared origins, mutual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as substance and function. This dialectical "xiang-xing" paradigm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t is reflected in the multi-layered construction of visceral manifestation theory, the cognitive approach of "inferring the viscera through manifestation",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treating the physique by observing the manifestation", and the academic feature of "emphasizing qi and body, unifying body and qi". Looking to the future, the "xiang-xing" paradigm can not only provide a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CM theor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but also demonstrate unique practical value in areas such as clinical precis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control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herefore, it can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CM, and contribute holistic and dynamic Chinese wisdom to contemporary life sciences.

Keywords xiang (manifestation); xing (physiqu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收稿日期: 2025-12-13; 修回日期: 2025-12-15)

[编辑: 贾维娜]

广告

欢迎订阅 2026 年《中医杂志》

《中医杂志》(ISSN 1001-1668, CN 11-2166/R)是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主办的中医药综合性学术期刊。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以提高为主, 兼顾普及”的办刊方针, 是我国中医药界创刊早、发行量大、具有较高权威性和学术影响力的国家级中医药期刊之一, 是中文核心期刊和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首届国家期刊奖获得者和中国期刊方阵双奖期刊、新中国 60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中国百强科技期刊、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 中医药科技期刊分级目录 T1 级期刊。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奖。

《中医杂志》主要栏目中当代名医和临证心得分别介绍名老中医和临床医生辨证用药治疗疑难病的经验; 临床研究介绍中医药治疗的新方法、新成果; 学术探讨、思路与方法、循证中医药、病例讨论、综述、百家园等栏目, 提供最新学术观点、研究成果与治疗方法, 成为学习中医药、研究中医药, 不断提高临床及研究水平的良师益友。

《中医杂志》为半月刊, 每月 2 日和 17 日出版, 每期定价 40.00 元, 全年 960 元。国内读者可以到全国各地邮局办理订阅手续(邮发代号: 2-698), 也可与本刊读者服务部联系邮购, 邮购免邮费。电话: (010) 64035632, (010) 64089195。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399 信箱, 邮编: 100044, 代号: SM140)。

本社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00。

网址: <http://www.jtcm.net.cn>。

